本书研究的，主要是日本德川时期的儒学和国学（不是中国语境下的“国学”）。在德川幕府统治年间，主流的儒学与同一时期的中华帝国相一致，即于朱熹处所集大成的宋理学，在日本则一般称之为朱子学。日本学者对本土所学习、吸收的宋理学的基本思想的归纳和分析，提供了关于程朱理学的不同于“中国式”的视角，舍去了宋明理学发展中的“细枝末节”或者说动态的演化过程，留下了程朱理学对日本思想界最为突出的影响的记录。借助“他者”的视角，有益于我们从侧面深入到宋理学的核心所在，或至少是其影响最大所在。

据丸山真男所言，朱子学呈现出这样的特点：“上层”部分是之前儒学中所未曾见过的关于天地宇宙的系统的理论，与“下层”的人性论贯通起来，构建起一套在理论上“完备”的思想体系。在应用层面，朱子学的宇宙论几乎可被视为人性论的“反射”（这似乎有倒果为因之嫌）。由于朱子学具有的过分的“完整性”，使得后来的朱子学家往往极度缺乏创造力。这实际上在说，朱子学以一种不恰当（不可持续）的方式将儒学带到了一处思维上的死胡同，其对创造力的抑制也意味着朱子学本身的保守性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这也是儒学的发展历史中前所未有的。

既然儒学在程朱理学这走进了死胡同，而程朱理学又占据着统治性的“主流”的地位，那么之后在思想领域任何有意义的变化与发展，无论是否被认为是继续在儒学的范式之内，大都呈现出对朱子学的背离和反叛。这一思想趋势在中华帝国表现为王阳明的心学，日本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，代表人物是以荻生徂徕（1666年-1728年）命名的徂徕学（也有学者将荻生徂徕与清代乾嘉学派相比较，我们以为徂徕学或许还是更接近于阳明学，因为并不像清学只在考据上反对程朱学）。在阳明心学的身上可找到徂徕学的与宋学“合理主义”截然相反的“非合理主义”，两者共同表现出从程朱理学的拘束中挣脱开来的思想上的解放性。阳明学与徂徕学不同之处在于，阳明学有着将关注点更多的从朝廷转向社会的鲜明特征，与之相对的，徂徕学却呈现出“极端的”政治化，即所谓的“全体人民皆官吏”，作者丸山真男进而甚至联想到马基雅维利。这种差异或许是源于中日这一时期政治上的不同取向，前者是登峰造极的古代君主专制，后者是国家大权归幕府但依然藩众林立的封建制。

作者使用的资源主要是欧洲的古典哲学和现代性理论，不无矛盾的是，作者致力于寻找日本思想史自身的现代性资源，将日本的“近代化”归功于朱子学的解体与对儒学的重新阐释。这与中国学者在晚明找寻所谓“资本主义萌芽”，是近似的努力。